

杭州现存唐代金石考

□ 陈天声

在杭州市现存的众多碑碣和摩崖石刻中,唐代以前有确切纪年的题刻仅有三处。其一是唐元和年间(806—820)卢元辅飞来峰摩崖诗刻,其二是唐开成二年(837)龙兴寺经幢石刻,其三是开成五年(840)的青衣洞口摩崖题刻。它们也是杭州市在原址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文化遗存,至今都已有近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卢元辅摩崖诗刻位于灵隐飞来峰顶东南隅石壁上,离地面约3米。这是卢元辅游天竺寺(五代前尚无上、中天竺寺,当时天竺寺即现下天竺寺)所作的一首七律,字迹至今尚清晰可见,其题刻年代为卢在杭任刺史期间(813—815),是杭州市现存年代最久的摩崖石刻,为“杭州金石之冠”。

游天竺寺

大唐杭州刺史卢元辅

水田千里学袈裟,秋殿千金俨释迦。

远客偏求月桂子,老人不记石莲花。

武林山价悬隋日,天竺经文隶汉家。

苔壁娲皇炼来处,泐中修竹扫云霞。

石刻幅面朝东北,大小为60×62厘米,右行共九行,每行8—9字,字径6厘米见方,共六十九字,楷体大书深刻,诗句隽永,书法遒劲。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卢元辅由河南县令升任杭州刺史,此公为中唐权相卢杞之子,工于诗文,其为官经历,历史上评价也较高。在杭三年任内,在灵隐建“见山亭”,823年白居易所作《冷泉亭记》一文记有此事。还在吴山上为伍子胥建庙并作《胥山祠铭》,旧志上赞铭文“文采焕发,流传久远”。

关于对这块诗刻的描述,《西湖志》和《杭州市志》上有两处出入,一是字体为“十厘米见方”,

实际是6厘米见方。(《两浙金石志》上所说“字径二寸”是正确的。)二是七律最后一句“洞中待我扫云霞”,碑刻实物和《两浙金石志》上是“泐中修竹扫云霞”。其中“泐”音“le”,是石缝的意思。

在《两浙金石志》、2000年版《杭州市志》、1995版《西湖志》上,提到这块题刻地点,均为“飞来峰神尼塔下”或“下天竺神尼塔下”。而据《灵隐寺旧志》所记,“神尼舍利塔”是隋仁寿二年(602),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为纪念收养他长大、并预言他“将得天下”的智仙尼姑,以其所嘱舍利,敕命在此所建之塔,塔高七级,是杭州建造最早之塔。北宋诗人郭祥正在1070年前后写过《神尼塔》,诗云:“神尼凿一塔,杳在碧云端。舍利夜光见,君须正眼观。”1050年王安石所作《登飞来峰》一诗,其首句就是:“飞来山上千寻塔”,可见北宋时塔犹存。可是到南宋中期时此塔已经倒圯,无迹可寻了。所以现在相问“神尼塔”均无人知晓。因此按神尼塔去找题刻,就无从找寻。笔者第一次由冷泉上飞来峰顶,寻觅多时却无功而返。第二次仿拟当年卢太守游迹,改由下天竺寺(今法镜寺)后山上峰顶,冒着酷暑攀藤蔓,钻石丛,沿途细细查找,蓦然回首,终见它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由冷泉沿石级上飞来峰,在近峰顶三岔口处向东行,即可在离路6—7米的右侧一排石灰岩石壁上找到诗刻。这石壁高约5米多,上面便是峰顶,九百年前其上当有一塔耸立。按此去找,这个杭州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是不难找到的。可是目前在所有有关景点介绍的书上,均未提到这块诗刻,其实应该让更多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有机会亲身感受这千年的文化遗存。

位于延安路灯芯巷口的龙兴寺经幢,建于唐

开成二年(837),幢身八面,高176厘米,对径65厘米,幢身刻有唐代著名书法家胡季良的行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约2.5厘米见方的字体,字迹秀逸,书刻精良,至今尚清晰可见。幢身短柱上有十六尊圆雕菩萨造像,容相饱满,造型生动。南侧字径约2.5厘米的楷书款识同样清晰:“开成二年正月一日建,建主郑彻,同建造僧宗良,同勾当造幢吴中则,处士胡季良书,都料匠吴兴沈郁弟咸刻字。”这与《两浙金石志》上所录完全一致。看来两百年来碑刻自然磨损不大,这显然与经幢一直保存在寺中室内环境有关。款识旁还用同样楷书刻着历代重修幢身的题记,最早为唐大中五年(851),最迟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该经幢曾湮没,明崇祯九年(1636)发掘出土归属龙兴寺。这一经幢在全国现存的最早经幢中排名第二,与排名第一、建于唐宝历二年(826)的广州光孝寺石幢,仅相差十一年。该经幢也是杭州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是古建筑中的艺术精品,且对后世的佛教建筑影响很大,现为浙江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山十二生肖石东南向坡下,有一个千年古洞叫青衣洞,洞中有泉,名青衣泉,洞口石壁上有一幅40×28厘米大小的唐代摩崖石刻。这是一幅历代未经任何修补、原汁原味的千年唐代原刻。由于百余年来洞址湮没失传,因此此幅摩崖石刻为现代人发现至今尚不足十年。(在清末编撰的《说杭州》一书和1995年新编的《西湖志》中,青衣泉、青衣洞项下均指明“而今无有矣”、“今泉无觅处”。)唐代奉道教为国教,道士的社会地位极高,云游所到之处,地方长官奉为上宾;这是一幅当年钱塘县父母官陪同南岳道士参访青衣洞时的题记。虽历经千年风雨,但由于洞口朝北隐蔽,且人迹罕至,刻幅居中的大部分字尚清晰可见,七行5厘米见方,华丽沉雅的八分隶书,笔力遒劲、波磔宽厚、神采飘逸,令读者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但其题刻年代,在现存实物上,由于“开成”两字下的年份数字正好是第一行的最后一字,处于幅边阴角凹槽,经长年雨流侵蚀,刻字笔迹与石灰岩风化后石纹浑茫交错,字迹漫漶不清,实已无法辨认。而不同的古书上却一直有着开成元年(836)和开成五年(840)两种说法,流传至今,难辨其实。清代编撰的《湖山便览》、《武

林坊巷志》和新近出版的杭州文化丛书《杭州的山》一书中均采用洞刻为“开成元年”一说。据笔者考证,这两种说法在历史上各有可靠依据,系分别来自问世仅相隔八十多年的两位宋代名家著作。“开成元年”一说来自周密在1287年所写的《癸辛杂识》一书,“开元五年”依据是陆游在1203年所写的大作《阅古泉记》。作为杭州市最古老的摩崖石刻之一,总应有个确切年代吧!究竟谁是谁非,这千年悬案现在应该解决了。

公元1203年,陆放翁应“当朝权相”韩侂胄之邀,为他在吴山的别墅“阅古堂”写了一篇游记《阅古泉记》,文中写得清清楚楚:“游按堙泉之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陆游写这篇游记的起因在文中也有交代,韩侂胄同他讲:“君为我记此泉,使后知吾辈之游,亦一胜也”。陆游当时已年近八十高龄,虽早已告老回绍兴老家,但一年前(1202年)南宋皇朝又重新起用他回临安编修国史,想必其时至少还身板硬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吧!为权相写游记,他可是认认真真的,扶着青衣洞洞壁,亲自察看后写的。好在当时题刻形成才不到四百年,字刻应该是清晰的,特别是隶书中的“五”字和“元”字,笔画更是“泾渭分明”,不可能看错的。可惜的是诗人当时没有抄录下题记全文,想来当时存世的唐代刻石尚不在少数,因而他只着重于题刻的年代和书法体的作者名字,这也是情理中事。看来陆游写的“开成五年”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

然而好景不长,游记写成四年以后,“阅古堂”就随着他的主人抗金兵败被劾下台而废湮,洞口改建道观,宋理宗曾赐名为“重阳庵”,以后年久荒圯。又八十年后,自宋亡后一直寓居在清河坊癸辛街潜心写作的周密写了《癸辛杂识》一书,这是一本辑录南宋以来武林遗文佚事、家乘旧闻、市井琐事的杂文集,中有一篇《游阅古泉》的游记,记述他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慕名游“阅古堂”故园的情况:“有石罅(音“hong”,意为“大谷”)杳而深,泉涓涓自内流出,疑即所谓阅古泉也,罅旁有开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塘县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书镌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镌佛像及大字‘心经’甚奇古,不知何时为火所毁,佛及残缺”。文中接着说:“且闻近多虎,往往白昼出没不常。”为此他们同游的三个人

甚至不敢走远,未及尽情畅游就打道回府了。最后他在文中说:写此游记目的是为了“劝阻好事之寻游者”。可见自宋末阅古堂、重阳庵废圯后,青衣洞一带早已是荒草萋萋、人迹罕至,以至于猛兽出没了。如此行色匆匆,所以很难说他在看碑文时有否看错或记错,同陆老先生为韩相写游记时的环境和目的是有大不同的。再说,该洞并非天然溶洞,据记载,洞是开成年间才人工开凿的,这碑刻不是开洞题记,只是开洞后旅游者的题名刻,所以其“开成元年说”就很难成立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周密写《癸辛杂识》一书时,同在临安,难道他没有看过陆游在八十年前写的这篇著名游记《阅古泉记》吗?真是事出有因,原来韩侂胄倒台后,陆游曾为此受株连,他为韩相写的两篇著名游记《阅古泉记》和《南园记》(为韩在长桥的另一处别墅“南园”所写)都被当朝封杀,所以在陆游的《渭南文集》中,这两篇美文均未被收入。(在韩倒台前夕,1207年已八十三岁的陆游被朝廷晋封为渭南伯,这是他最后的封号。)一直到明代中叶,毛晋辑的《放翁逸稿》中才将这两篇著名游记收入而传世。且说这一片风水宝地,一直要到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西川道士冉无为重建“重阳庵”后,才重新热闹起来,直至明代成为道教全真教丛林,后又经清代几次重修,一度更名为佛教直指庵,到咸丰十一年(1861)才全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光绪四年(1878),官府和地方士绅为纪念阮元,在此建阮公祠。方志记载,为建祠筹资曾酝酿了十年,最后仅耗用官钱就达万缗(相当于白银万两),可见其规模不小。祠年久废圯后,民国期间在此先后改建为省农会事务所、聋哑学校等。学校停办后,校舍改住居民至今。

小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研期间,曾在校图书馆馆藏古籍中找到一本田汝成撰写的《西湖游览志》,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初刻本。书中有关“青衣泉”一项抄录如下:“崖壁镌有唐开成五年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唐县令钱华,道士诸葛鉴八分书题名,傍镌佛像及大字‘心经’。”其后大段写景,语调显然照抄《癸辛杂识》,但在此把年份改正了。

清乾隆时代金石学家翁方纲(1742年进士)1780年左右所著《复初斋诗集》卷二十六《西湖

青衣洞唐开成题字》一诗的开篇,记有青衣洞题刻全文:“大唐开成五年六月十八日(缺四字)岳道士邢金,钱唐县令钱华记,道士诸葛(缺一字)元书。凡三十四字,八分书。”后为诗正文:“青衣洞口八分记,闻诸周密与陆游。……一县令偕二道士,道士名字烦讨求。……飞泉溅沫落在,五字渤损烟雨愁。……”写得很清楚了。

《阅古泉记》问世六百年后,清嘉庆年间(1805年前后)浙江巡抚阮元编录《两浙金石志》,辑录了省内从秦会稽刻石到元末止存世的历代金石。在其卷二第42页“唐南岳道士邢口等题名”项下写着:

“大唐开成五年六月十八日□□□□
岳道士邢□ 钱唐县令钱 华记道士诸 □□
元书”

右题名在钱塘县吴山青衣洞,文七行八分书,径寸余。

《癸辛杂识》云:“阅古泉旁有开成元年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唐县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书镌之石”,今拓本“开成”下确是“五”字,邢下只一字,似“全”字,诸葛鉴元乃书石之人,并非镌石者。

这位对杭州文教事业、城市和西湖建设颇有建树的巡抚大人,还是著名的经学家和金石学家,也热衷于杭州的山山水水。笔者曾在飞来峰玉乳洞口石壁上发现他的留名题刻“仪征阮元常来游此”,可见他的官当得真是潇洒。自乾隆六十年(1795)起,他在杭为官十五载,先后当过浙江学政(教育厅长)和两任巡抚,对金石、考据有深邃造诣,治学严谨。在这里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癸辛杂识》对青衣洞石刻记载历来以讹传讹的三个错误:一是根据拓本,明确刻石年代为开成五年,不是元年。二是县令陪同的贵宾南岳道士的大名是邢全,不是邢令闻(笔者查证,石刻实物上至今“全”字还隐约可见,与隔行的“令”字笔画完全不同,而且“邢”下也只有一个字的位置)。三是诸葛鉴元是书石之人,不是刻石者。古代在摩崖上题刻,要先把石面打成平面,然后由书法家用矿物颜料写字上去,叫“书丹”,再请刻石匠依此镌刻。《书史会要》一书载:“诸葛鉴元善八分书”,诸葛先生是唐文宗时著名书法家,陆游在《阅古泉记》上也特别指出青衣洞题刻是他的书

法。所以书石之人是诸葛鉴元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所谓“八分书”，其实是始于东汉的“后期隶书”，方正古拙的“汉隶”增加了掠捺和蚕头雁尾的装饰后变得华丽飞动起来。因其势左右相背、字体点划和结构如八字分开，故称“八分书”。又由于古文中“八”和“分”两字完全同义，所以也称“分书”。

关于青衣洞石刻，实际上两百年前，巡抚阮大人已为我们做了可靠考证，以他当时的职位和学术上的严谨治学态度，完全有力量调用当时的资料、文献甚至各种拓本和人力、物力来保证这一本专业金石著作的历史可靠性。所以笔者以为，今后出版物上对这一文物点的规范说法，应以《两浙金石志》上当时实录的铭文为准。题刻

年代为唐开成五年，书石作者为诸葛鉴元，这两点是可以确定的。关于青衣洞的发现和来历，南宋《咸淳临安志》上叙述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至今代代相传：“唐开成年间，西川道士韩道古结茅以居，一日行至洞口，见青衣童子问之不应。良久入洞，逐之不见，闻风雨之声毛发竦栗而出。”遂命名洞为青衣洞，泉为青衣泉。明代时洞口尚有“青衣童子亭”，亭中塑有着唐装、梳双髻的青衣童子。南宋时，因韩侂胄在此建“阅古堂”，引泉水建玛瑙石池，洞泉曾一度被更名为“阅古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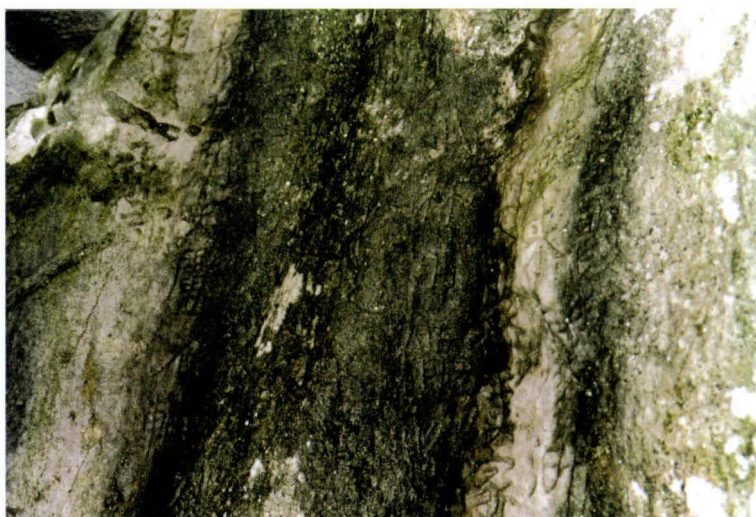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杭州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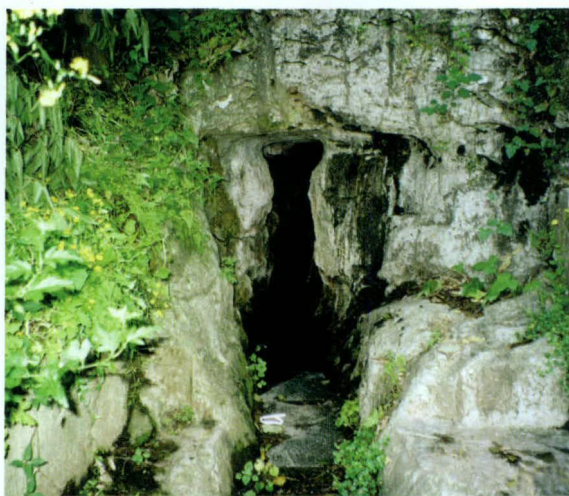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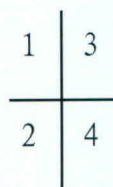
皋园话旧

1
—
2

杭州现存唐代金石考



1. 1927 年左右的皋园遗迹
2. 唐卢元辅诗刻摩崖



- 1.唐龙兴寺经幢
- 2.隋塔
- 3.吴山青衣洞
- 4.青衣洞石刻